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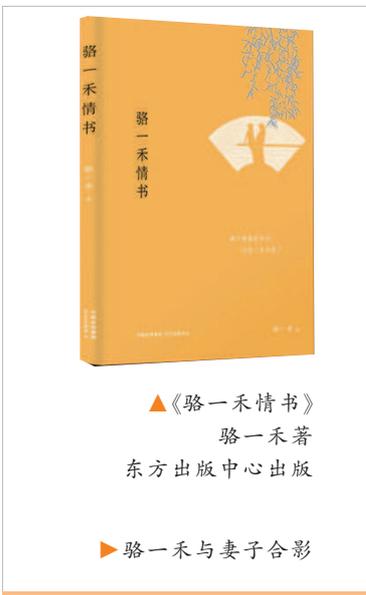
那封来自1980年代的情书

徐丹

亲爱的读者，你们将要看到的书信写于1980年代，作者是诗人骆一禾。在那个以诗歌为先锋为光荣的时代里，他曾经是北大校园诗歌的领航者，也是那十年里中国诗坛最好的诗歌编辑与诗歌批评家；当他的生命与80年代同时终结时，年仅28岁，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后的抒情诗人，而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史诗性长诗所发起的冲刺，至今鲜有人能及。在他为诗而祭献青春热血的30年后，再版他的诗集以及整理集结他未发表的遗作，既是因为骆一禾作为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特殊意义和特别存在，也是因为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到了80年代的精神生活于我们今天的珍惜与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一份个人感情生活的纪念，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之纯之密的一个见证。

以上是骆一禾的妻子张珏在《骆一禾情书》的序言里所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对骆一禾本人及其成就最恰切的总结，毕竟这些情书是他写给她的，毕竟她比任何别人都要了解他。如题所见，这是一部私人书信集，但若仅凭字面信息，把这本书归为庸常、单一甚至浅薄的言情作品，那就着实埋没了它的存在，也辜负了它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这部作品的纯真、丰富、深切和奥义，早晚会被时间证明。

骆一禾没有等到属于他的最好的时代，但可幸的是，这份爱情给了他创作的出口、灵感的寄托和内在的骄傲。在这部交织着个人思绪和命运写照的书信集里，骆一禾不仅叙写了与妻子相知、相恋、相守的爱情故事，而且也在信中对诸多文人、文章和文事进行了独到的评论，文笔生动，感情深切，征引广博，学养丰富，从中可以瞥见他作为一个独放异彩却不幸早夭的青年诗人的文思和才



▲《骆一禾情书》
骆一禾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 骆一禾与妻子合影



智。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的代表性人物，骆一禾在史诗性长诗上的执着、抒情与天赋，在整理海子遗作时的坚持、投入与远见，都在书中详尽呈现。因而在骆一禾逝世30周年之际，出版他的这部遗作，既是对他本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那一段远去难再的燃情岁月的深刻追怀。

骆一禾的浪漫主义

说到浪漫，不得不折服于骆一禾的方式，在与张珏交往伊始，他便借着对她一首短诗的精彩评析，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非正式的通信，也是《骆一禾情书》的第一封信，在就诗论诗的间隙，骆一禾很自然地表露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我们在世界上原是有限的，我们的心得到爱也容易，一些简单朴素，始

终在用自身的形态、举止说明着生活的事物，就可以使我们的情感得以依附，得以寻找到一个寄托……”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的暗示，而事实上，在这封信之后不久，他们因为机缘巧合的际遇而最终走到了一起。

确定恋人关系之后，骆一禾依旧保持着与张珏通信的习惯，其实他们住得不远，每天见面也是易事，但这是骆一禾热衷的交流方式，也是他的浪漫主义。这些书信从1982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88年10月，其内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恋人之间的互诉衷肠和表白情愫，生活细节、工作日常、看书体会、文人逸闻甚至是大篇幅的文学评论都夹杂其间，尤其是他对诗人、诗歌和现代美学的论道，让这些书信集显现出了一种文学的厚重感和神圣感。骆一禾始终认为诗歌是发自内心

感受那些独特结晶的构合体。而最后，它需要一种美词气象的光辉。”这些言辞中闪耀的魅力，或许正是张珏欣赏骆一禾的地方吧。

骆一禾与1980年代

在这部私人书信集里，骆一禾言及的范围可谓丰富，不只是恋爱中人程式版的抒情，也包含对当时文坛人物代兴和文艺动态的一些私见和预期。彼时，骆一禾在《十月》的小说编辑部任职，在编辑校对诸多文稿的同时，他也能以一名局内人的身份去发掘和鼓励文坛新人，那些他写给作者的回信，短则千百字，长则十数页，由此可见他的尽职尽责和良苦用心。因为过于投入和专注，他在给张珏的书信中，也会不自觉地聊到自己的工作，提及一些自己已经表达过或是还来不及抒发

的意见和看法。故而，我们不仅可以窥见骆一禾的个人素养和文学态度，而且也能感受到他与那个盛产文学的1980年代有着何其紧密的交际和关联。

“我觉得现在：张承志、汪曾祺、史铁生、王安忆、邓友梅，可能留下一些比较好的、为一个大时代文学打基础的小说来。这个名单还可以包括谁呢？它可以再延伸一些，但不会太长。”这是骆一禾在书信集里写到的一段话，在3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作家的表现和成就已经完全验证了他的敏感、睿智和断言。尽管当时骆一禾很想跳出小说组去管他更有把握的诗歌，但他还是在小说领域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识和远见，其对小说创作和文人潜能方面的看法也是客观独到的，由此也足可见骆一禾在催生1980年代文学风貌上的微妙作用。

通过书信中的内容可知，在1986、1987、1988这三年中，骆一禾相继创作并发表了多首抒情长诗，同时也在自己负责的《十月长诗》上先后推出了海子、西川等诸多后来蜚声文坛的诗人。骆一禾曾在自己的诗里这样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态度：“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在宏大构思与写作长诗这个问题上，骆一禾与海子是惺惺相惜的，即使在海子因写作长诗而面对外界诸多的怀疑、嘲讽和批判时，骆一禾始终都是最理解他、最支持他的那一个。及至海子去世，骆一禾为整理海子的遗作、纪念宣传海子而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在离世前的最后两年，他仍为了弘扬海子的诗歌生命而苦苦挣扎着、坚持着。今天，当我们想起骆一禾时，不由得会想起海子；而提到海子时，我们也不能绕开骆一禾。他们先后在点亮诗歌生命的同时燃尽了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我们都该记住他们。

胡适日记中，有关疾病的记载不胜枚举。前期主要是伤寒、腹泻等小病。迈入中年后，肛周疾病、肾炎、心脏问题开始出现。其中，胡适的痔疾格外出名，在1922-1923年的日记中曾反复出现，十分仔细连贯。作为文坛名人，胡适的痔疾几乎人尽皆知。以至于1930年郁达夫身患痔疮时，向胡适去信，询问求医的地址。胡适对此不甚避讳，显然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而其诊疗时中西医法的选择与疗效，也可一窥民国时复杂的中医形态与矛盾的中医观念。

关于痔漏的记载，胡适日记首见于1922年7月，次年5月复发，1925年底在上海根除。其中的中医参与可分为三类：亲友提供的“家庭医疗”、北平名医陆仲安的诊看、痔漏专家潘念祖。

1922年7月间首次发作时，胡适就觉得“坐如针毡，吃完饭匆匆回家，面已失色，痛得很厉害……”因晚间无法就医，只好接受江冬秀大姐江润生提供的偏方：将生男星、生大黄、冰片三药捣碎，用醋涂上。这些药材有清热止痛、攻积导滞、散结消肿之效。另外，江冬秀也多次提供药方给胡适服用，包括黄连、黄芪等泻药。这些家庭中医法，内服药似不起作用，外用药虽能暂时软化脓肿、缓解疼痛，面对复发也无可奈何。因此胡适使用这些药方时，多是事发突然、疼痛难忍的无奈之举，

不乏试验的成分。

名医陆仲安与胡适渊源颇深，早在1920年，胡适即因脚部浮肿，于协和医院诊治无效后，请陆仲安开方，诊为“脾肾两伤”。胡适痊愈后，于次年3月为其藏画《秋室研经图》题跋表示感谢：“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又在日记中称：“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此后，陆仲安几乎成为其家庭医生。因此，1922年痔疾突发时，陆氏作为第一位上门看诊的医生，诊为痔疮。但陆仲安未参与此病的疗愈，至多在日常护理中略起作用。

1925年，胡适在上海宝隆医院再次开刀后，经一位西医介绍，请痔漏专家潘念祖治疗。有关潘氏的记录有限，其人也并非陆仲安一类的职业中医，还是“吃鸦片的，上午不看病，下午才门诊，晚上才出诊”。医费也颇高，好像是“一百五十块银圆”。或许碍于潘家秘方，胡适未记述其诊疗方法。但此后36年不曾复发，可见潘氏诊疗的有效。参考另一民国痔漏专家黄济

胡适的中医观

刘佳欣

川写作的《痔漏疗法》，潘氏的医法可能采用了外科的“挂线”法，结合多种内外用药，兼以药熏等日常护理。

胡适在协和、宝隆医院接受的两次手术，都是西医的切开引流法，容易复发。陆仲安及家庭医疗不起作用，是由于这些药方不完全对症。而参照黄济川的行医经历，潘氏秘方应是一种民间行医经验所得的“手艺”，因此屡试不爽。

胡适对中医始终持基本的批判立场，提倡“废医存药”。观察其痔疾的诊疗，这一立场也很鲜明。对中医药方，胡适始终持怀疑的试验态度。向潘氏求医，也是由西医推荐。而潘氏虽治好了胡适的病，胡适文中却无记载，也未因此转变对中医的批判。相比之前对陆仲安的酬谢，潘氏的功劳显得微不足道。

现在来看，潘氏等痔漏专家应属中医外科。但直到现代医学教育建立以前，正骨、治疮乃至拔牙等医疗活动，多由赤脚医生从事，与内科为主的儒医有根本区别。这些外科医生的疗法大多是经验积累，在父子、师徒间代际相传，形成一种特

殊手艺，社会地位远低于儒医。如潘氏依靠家传秘法，行医安排很随意，要腾出半天来抽鸦片。尽管这些医生的疗法中也包含一定比例的内服药，但药方的有效性依靠长期专门操作中的试验，与全科医生的药方有本质不同。

因此，尽管潘念祖根治了胡适的痔疾，但其系“江湖郎中”里的专科医生，不属于胡适、鲁迅等人探讨的“中医”范畴。胡适的谢意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银元”，与剃头匠、裁缝等从业者待遇相同。

由于中医的概念界定，胡适讨论的中医药主要指全科儒医，“铃医”并非其讨论对象。与概念的模糊相似，胡适的中医观也是暧昧的，体现着其思想的矛盾。一方面，胡适作了许多号召全面西化、批判中国传统的演讲，又在另一类演讲中强调“整理国故”，弘扬“国粹”。面对这种矛盾，胡适自述为“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痔漏的诊疗也为这种矛盾作注。主动寻求西医无果后，胡适曾试验地服用中药，并最终求诸“中医之外”的“江湖郎中”，由此可见民国中医问题的双重矛盾。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以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疗为前提，中西互补达成的。